

九域芸香

书楼觅踪

下
韦力 著

九域芸香

书楼觅踪

下

韦力
著

吴騫·拜经楼 为慕一廛藏百宋，更移十架庋千元 / 999

章学诚·瀚云山房 以史部为专藏 / 1007

洪颐煊·小停云山馆 拙于吏治，独擅收藏 / 1015

张廷济·清仪阁 金石独专金，书法贵大人 / 1026

管庭芬·花近楼 别下名丛出其手，避难抄撮小品留 / 1032

冯本怀·抱珠楼 冯氏三楼唯存，书归西泠无目 / 1038

黄澄量·五桂楼 仿天一然开放，拆藏本编明文 / 1043

徐时栋·水北阁 二毁三建，月湖书生 / 1051

李慈铭·越缦堂 以日记得名，由日记遭骂 / 1058

陆心源·皕宋楼 无人体谅的结局 / 1066

徐树兰·古越藏书楼 书楼开放之先声，烟叶种植之首倡 / 1074

朱一新·小拙齋 学术汉宋兼采，藏书未详其重 / 1081

孙诒让·玉海楼 甲骨研究第一人 / 1090

沈曾植·海日楼 百卷之书，百龄之兆 / 1098

沈德寿·抱经楼 抱经楼至此为三，抄书不择善遭贬 / 1105

黄绍箕·蓼绶阁 卧雪旧藏，终归籀园 / 1112

目录

11 湖北

杨守敬·观海堂 东瀛探酆，酆学腾誉 / 903

柯逢时·息园 书楼无痕，绍裘尚在 / 912

12 湖南

伏生·二酉藏书洞 神仙所贻，斯文所寄 / 921

邓显鹤·南村草堂 湘学复兴导师，船山第一功臣 / 929

曾国藩·富厚堂 英名掩藏绩，楼在书无痕 / 937

13 贵州

黎庶昌·拙尊园 外交小成，刊书得名 / 949

14 浙江

屠隆·古娑罗馆 戏曲家中的藏书家 / 961

张岱·快园 苦难不能改变的快意 / 969

祁彪佳·旷园 难以确定地点的藏书处 / 976

曹溶·倦圃 古书流通的倡导人 / 982

朱彝尊·潜采堂 诗词之名掩盖了他的藏书 / 987

鲍廷博·知不足斋 恨西风吹净了无痕 / 992

目录

周庆云·梦坡室 以琴书著称的藏书家 / 1120

张寿镛·约园 以藏明刻本为主体的观念 / 1128

蒋汝藻·密韵楼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何用慨然 / 1136

王国维·故居 博涉群籍，数臻巅峰 / 1142

黄郛·文治藏书楼 百年功过，由人评说 / 1148

刘承幹·嘉业堂 私藏书量天下第一 / 1153

余绍宋·寒柯堂 首编书画解題，挥毫任公书楼 / 1160

15 江西

张位·闲云馆 宁王旧迹，十万藏书 / 1171

胡思敬·问影楼 江西第一家图书馆的建立者 / 1178

16 福建

郑樵·夹漈草堂 恭请朱熹吃豆腐 / 1189

陈第·世善堂 古音初判，井圈寄思 / 1196

徐燏·徐燏·红雨楼 兄弟二人竟然有五座藏书楼 / 1205

曹学佺·石仓园 因建藏书楼而发现了田黄石 / 1211

李光地·榕荫书屋 力挺理学，终被污名 / 1217

17
广东

林佶·朴学斋 平生有书癖，四写艳藏坛 / 1226

陈寿祺·小娘嬛馆 闽中经学正传，藏书独秘难窥 / 1234

梁章钜·黄楼 读书曰专实博，楹联杂录誉今 / 1241

黄宗汉·一六渊海 实干讷言，终遭革斥 / 1254

龚易图·大通楼 晚清闽省藏书之冠 / 1258

陈宝琛·沧趣楼 未曾踏入的书楼 / 1265

梁廷枏·藤花亭 睁眼看世界，回转第一人 / 1277

潘仕成·海山仙馆 其兴也速，其败也忽 / 1285

李文田·泰华楼 专研西北地理，喜藏名碑禁书 / 1293

徐润·竹石山房 商场奇才，书业怪杰 / 1302

陈伯陶·瓜庐 居港建书馆，旧藏捐道观 / 1313

康有为·万木草堂 启蒙从藏书开始 / 1320

陈垣·励耘书屋 每次搬家都要加大放书的房间 / 1327

王云五·岫庐 发明四角号码，出版《万有文库》 / 1335

容庚·颂斋 金文巨擘，丛帖一人 / 1346

冼玉清·碧琅玕馆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 1352

杨守敬

(1839—19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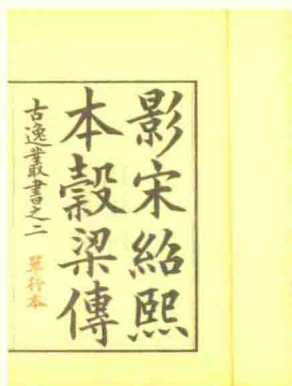
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钱币学家、藏书家。杨守敬于同治元年(1862)中举，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后更为存古)学堂总教长。1909年，杨守敬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著有《水经注疏》《日本访书志》《湖北金石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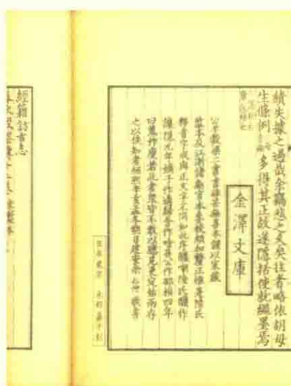
杨守敬·观海堂

东瀛探邴，邴学腾誉

日本受中国传统影响至深，明治维新时期，却认为传统妨碍了他们的整体进步，于是对中国传统文献几乎彻底遗弃。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把历代珍藏的古书全部像清垃圾一样，卖到了古旧书店。杨守敬却开始了他的收书之旅。辛亥革命时，杨守敬避居上海，观海堂藏书在武昌幸得革命军保护，未遭兵祸，后因校订《水经注》之需，藏书运往上海。1914年，杨守敬来到了北京，他的书也部分北运。杨守敬病逝后，观海堂藏书分散在几个地方的图书馆。这就是杨守敬藏书的归宿。



《穀梁传》古逸丛书本书牌



《穀梁传》木村嘉平刻书牌记



《穀梁传》木村嘉平版卷首

杨守敬在藏书界名气很响，这个声誉的得来，跟他在日本的访书有很大关系。因为访书，他还刊刻了一部古籍丛书。这部丛书之美、质量之高，一直被人赞许到了今天。

杨守敬的科考运气不佳。他是举人出身，参加了七次科考都没能考取进士，但他却意外得到了一次出国常驻的机会。他作为日本公使的随员，在日本工作了几年，他的工作业绩几乎没人提及，然而他在收书、刻书方面却博得了大名。

杨守敬的日本访书缘起，跟近代名人黄遵宪有一定关系。当时的黄遵宪在日本使馆做参赞，据说某天，两人无意间在大街上碰到了，聊天过程中，黄告诉杨，日本的书，市面上有不少中国的古刻本与写本，如果有条件的话，要想办法去收集一些中国失传的古书。杨听了黄的这番话，于是开始到日本的古旧书店去访书。

那个时候，正赶上日本的明治维新，社会上的主流意识是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日本受中国传统影响至深，经过反思，日本人认为，这种传统，妨碍了他们的整体进步，于是对中国传统文献几乎是彻底抛弃。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把历代珍藏的古书全部像清垃圾一样，卖到了古旧书店。货源的大量涌现，而买家又迅速减少，致使书市上中国古

书的价格一落千丈，而此时杨守敬却开始了他的收书之旅。这样的运气，羡慕天下爱书人。日本有收藏中国古书的传统，自隋唐开始，日本人整船地从中国买书，再加上日本几乎没有受到过外族占领本土的侵略，这两个原因，使得日本保留下许多中国已经失传的文献。而这些珍藏了千百年的文献，能够大批量出现在书市上，这样的好机会，的确千载难逢，于是杨守敬开始大量购买。然而，杨守敬毕竟只是使馆工作人员，收入有限，古书再便宜，累加到一起，也是个大数目。杨认为，他想要买到更多的古书，则必须要想出其他的妙招。

因为杨守敬本来就对书法有爱好，他在北京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就到琉璃厂去收书和买碑帖。杨守敬买书也是个疯狂的人，他在同治二年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时，竟然从琉璃厂买下了一车的书，科考落榜，他准备返回湖北时，则发了愁。那个时代，飞机、高铁当然没有，把这一车书运回湖北，是很艰难的一件事。但杨守敬还是想出了办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雇一三套车，老马瘦骡，本不堪长途，又加以久雨泥泞，沿途雇马骡牛帮驾，中途又买一骡，未至（湖北）樊城，骡复毙。每日半夜未能抵站，辛苦万状，幸出都时尚有百金，至樊城已罄尽，假贷同行者，由襄河辗转至沙市而归。”为了运书，竟然把骡子都累死了，可见杨守敬爱书疯狂到了什么程度。

后来的几次在北京考试期间，杨守敬仍然在买书，但此时他又开始大量地购买碑帖，同时为了研究古文字，也开始买古钱币和古印。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对他所购之品进行研究，他竟然把这些碑帖和古印带到了日本。他带到日本的数量很是巨大，仅碑帖拓本就有 13000 多册。这个数量可谓巨大，他带这么大量的拓片前往异乡他国，似乎不只是作为自己学习的材料，因为我知道，13000 册的碑帖将会是怎样大的一个体积。他的动机暂且不猜了，但结果不知道是否出乎他意料。他在跟日本书法界人士的交往中，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这些收藏，日本人对他的这些藏品大感兴趣，由此让杨找到了买书钱的来源。他在买书没钱的时候，就用自己带去的这些碑帖、古印换书，他就是用这种办法，成就了自己的购书大愿。

可是日本人为什么愿意拿古书来换他这些碑帖呢？其实这里头也有

个缘由。日本的书法界受中国影响很深，近千年来，书法的学习主要是通过法帖，这也就是所说的帖学，与之相对的则是碑学。乾嘉学派对古文献的研究，使得金石之学大倡，而书法界也可能是受学界的影响，开始关注古碑。经过包世臣的提倡，碑学渐成书法界的主流。而杨守敬在日本之时，也是向日本书法界大讲碑学，经过他的努力，日本书法界的风向，迅速由帖学转为碑学，正因如此，杨守敬被日本书法界称之为“杨守敬旋风”。连带的结果，是他携带的大量碑帖价值腾升，所以他说：“幸所携汉、魏、六朝碑版亦多日本人未见，又古钱、古印为日本人所羨，以有易元，遂盈筐篋。”

其实我最好奇者，是杨守敬从未去过日本，那个时代的消息来源，远不如今天这么便利，他何以能够了解到日本书法界的情况？退一步讲，即便他提前了解到了，那他所知道的结论，是日本人还没有接受碑学，那他哪里来的勇气，要带着如此数量之众的碑帖，前往一个无人赏识之地？难道他有必胜的信心，觉得自己能够凭一己之力改变一个国家书法界的风向？他真是一个胆大如卵的人。转念我又联想到他当年用骡马之车把一整车书千里转运的经历，那个时候，他仅 25 岁，就能干出这等疯狂之事。而他到日本访书的时候，已经 43 岁，虽然增加了一些阅历，但他那勇往直前的性格，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

但日本人也不傻，没过多久就感觉到，让杨守敬这样疯狂地买下去，很多好书就再也见不到了。更何况，虽然散出来的书很多，但真正的好书永远是少数。经杨守敬的这一番搜罗，市面上的好书就迅速紧俏了起来，价格迅速攀升，以至于让杨守敬感慨道：“余之初来也，书肆于旧版尚不甚珍重。及余购求不已，其国之好事者，遂亦往往出重值而争购之，于是旧本日稀，书估得一嘉靖本，亦视为秘籍，而余力竭矣。”他说当地人本来并不重视古书，经他这一番抢购，让当地人也跟风，致使市面上的好书很快少了，而书商哪怕征集到一部嘉靖本，也觉得得到了珍宝，价钱自然可想而知，这让他难以再接着买下去。但杨守敬很是达观，他认为，即使如此，自己的行为也带起了好风气：“然以余一人好尚之笃，使彼国已弃之肉，复登于俎，自今以往，谅不至拉杂而摧烧之矣，则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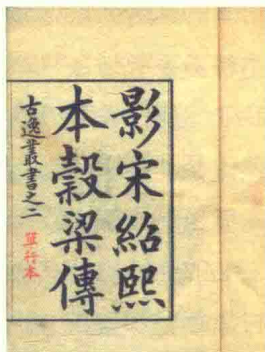
之视为奇货，固余所厚望也。”这种“得鱼同一乐，何必我持竿”的达观，真让我倍感佩服。

对杨守敬的日本访书，严佐之先生总结出了如下几点伟大意义：“杨守敬开了近代学者海外访书活动的先河，沟通了日本藏书界文献信息交流的渠道，拓宽了中国文献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并打通了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新领域。”这几句话，高度概括了杨守敬日本收书的价值。对杨守敬的这个行为，早年也有不同的解读。比如1929年4月6日的《申报》上，有一篇文章名字是《记杨守敬报复甲午之役》。仅这个文章名拔起的高度，就超过了“文革”语言中常用的“上纲上线”。这篇文章的署名是“觉迷”。文章中说，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挥不去的伤痛，而“杨守敬以彼日人侵略吾主权、侵略我土地，吾以弱国，处以无可奈何，虽于不惜倾其家产，而于无形之中侵略其文化，以为报复地步，是其眼光之远、用心之深，实使吾人钦佩者也！”把访书活动提高到政治高度来解读，甚至能品出阶级仇、民族恨，这位觉迷有当政治家的潜质。

杨守敬日本访书的第二大成果，则是《古逸丛书》的刊刻。这部书其实是杨守敬协助清朝驻日本公使黎庶昌所做。可能是受杨守敬的影响，黎庶昌也开始在日本买一些中国失传的古籍。因为所收之书都是孤本，因此黎、杨二人决定，将这些书刊刻出版，以使这些书化身千百。于是，他们就边访书边在日本寻找水平高的刻工。杨守敬不但有很好的鉴赏力，做事

严佐之：

生于1949年，国内外知名的古籍整理研究和目录版本学专家。他早年先后师从顾廷龙、潘景郑、徐震堉、周子美等前辈大家，学兼众长，旨归会通，具有相当丰富的目录版本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著有《古籍版本学概论》《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等。



杨守敬督刻《穀梁传》
古逸丛书本书牌



杨守敬督刻《穀梁传》
古逸丛书本卷首

也很认真。在刻书的过程中，杨守敬经常到刻工的家里去检查刻版的效果。一般而言，要检查刻版的质量，首先要将版片用纸张刷印出来，通过印样来确定版刻的优劣。但杨守敬却有独特的本领，他检查版样，不用做刷样，直接看木版原片就能分辨出好坏。他的这个本领，让日本刻工有些不服气。某天，刻版店的主人跟杨守敬说，这里摆放着 18 张版片，其中有一张是这里 18 位刻工中的师父刻的，你能不能仅看版片，把这张师父刻的版片挑出来？杨守敬逐一看过之后，果真挑出了那张师父所刻者。这让在座的刻工们掌声如雷，认为这是神人才能做到的事情，而第二天的报纸，也刊载出了这段趣事。

杨守敬找到的刻书坊是木村嘉平。这个木村嘉平，家族中五代都是日本的刻版名家，而且每一代都叫同一个名姓，而杨找到的是第四代。木村嘉平所刻之书确实很漂亮，他给杨守敬所刻的几种《古逸丛书》零种，我陆续都已收得初印本，以我的眼光看，其中刊刻最漂亮的，应该是《穀梁传》。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到陆昕家看书时，他给我出示的第一部书，竟然也是这部《穀梁传》的美浓纸初印本，于是我二人兴奋地讨论起此二书的绝妙之处。这种朋友间的默契，最让人感到惬意。而这第四代木村嘉平，却年仅 28 岁就意外去世了，这让杨守敬很是哀伤。杨守敬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此文的第一段就是：“木村嘉平者，日本梓人第一。余为遵义黎氏刻《古逸丛书》，中有影宋本《穀梁传》，最难措手。乃以属之嘉平，逾年刻成，意出原本上。藩伯寅司寇称为：‘自有天地以来，未有如此之精者。’”杨守敬的这段评价确实很高，他认为木村嘉平的刊刻水平是日本第一。他同样认为，木村嘉平给他所刊刻的《古逸丛书》中，最出彩的一部是《穀梁传》。不仅杨守敬认为《穀梁传》是最好的一部，他还引用潘祖荫的话来予以评价。而同时代的藏书家叶昌炽也对《古逸丛书》很是夸赞：“摹勒精审，毫发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纸，洁白如玉，墨如点漆，醉心悦目。书成旋即至沪，即以其板付江苏官书局贮之，流通古籍，嘉惠后学。”叶昌炽的赞语说得很是到位，只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他说《古逸丛书》的书版从日本运回来之后，赠给了江苏官书局，此局又拿这套书版接着刷版发行，以广流传，而今

市面所见之《古逸丛书》，基本都是运回国内后刷本，与日本后刷本相比，则版面清晰度相差甚远，据说这是中日两国刷版方式不同而产生的这种难以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些年来，《古逸丛书》零种时有出现在市面上，然美浓纸本全套 26 种者，却一次也未曾得见。上拍之全套者，一律为国内后刷。据说当年在日本用美浓纸所刷初印本，仅百部。如此少的数量，看来这种初印零本也值得收藏。

杨守敬回国时，把他从日本买得之书全部运了回来。他原本在黄州也建有藏书楼，名叫“邻苏园”。此次回国后，他定居在了武昌的菊湾，并且在此建起了藏书楼，名叫“观海堂”。书楼建成之后，他把邻苏园的旧藏也运到了观海堂内，跟他从日本访回之书放在了一起，因此，在菊湾观海堂藏书时期应当是杨守敬藏书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时期。

十几年前，我曾到武汉寻找杨守敬的故居，结果却无功而返。十几年后，再来武汉。这次的武汉之行，我把“宝”押在了陈琦先生身上，事实证明，这一把押对了。这次在武汉的寻找，比我以往顺利了许多，虽然赶上了雨，给这天的寻访增加了些难度。

我上次在武汉打听菊湾，问过多位老人，他们都告诉我，这条街早已被拆得没了踪影。陈琦告诉我，菊湾街还有一段小尾巴没被“割掉”。来到这一带的时候，果真在一片绿地之后看到了“菊湾街 3 号”的标牌。看到“菊湾”二字，让我大感兴奋，虽然眼前已经看不到观海堂的楼体，但这毕竟是藏书楼的旧址所在。菊湾的面积很小，站在街边看过去，这一廛之地，占地面积超不过 30 平方米，以此推论起来，这一带都应当是杨守敬旧居所在。而今，在这个旧居之上，建起了两座宿舍楼。宿舍楼的正面为菊湾街 3 号，侧面则为 7 号，不明白这是怎样的标注方法。3 号的这一面，有一间“红磨坊棋牌室”，里面哗啦哗啦地洗牌声吸引我走到了门口。

这座宿舍楼的右边，有一个院落，陈琦说，这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雨中走进这个院落，里面除了几个避雨的游客，静悄悄的也没什么声响，索性就在里面参观起来。陈琦说，这个院落原本是张之洞当湖广总督时创办的北路学堂，1927 年，国共两党在此合办了这个讲习所，当时有三个常委，毛泽东为其中之一。讲习所的课堂里悬挂着孙中山的像，

两边则是悬挂着国民党的旗帜，这个讲习所距离菊湾不超过20米，而毛泽东当时的住所则在菊湾的另一侧约十几米处。如此想来，毛泽东从住处到他的办公室，必定要经过杨守敬的旧居，可惜他们没能碰上面，因为杨守敬早在毛泽东在此居住之前的12年，就已去世了。

毛泽东知道杨守敬。1954年，毛泽东跟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在读史书的时候，总觉得缺乏一本可靠的历史地图集做参考，吴提到了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毛认为此书很好，让吴想办法将其整理出版。由此可知，杨守敬在舆地学上的成就受人肯定。

读初中时，记得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古文名叫《三峡》，这篇文章出自郦道元的《水经注》。这篇文章是要求全文背诵的，我记得该文第一句是“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尤其这几句话的最后几字——“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用了一个特殊的修辞手法——并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修辞手法，也正因如此，使我牢牢记住了它。然而我自从关注了杨守敬，他却对我背诵的这段《三峡》有着“毁灭性”的打击。杨守敬说，《水经注》中最为精彩的这一段，也就是从“自三峡”到“泪沾裳”并不是郦道元所写，而是郦抄的《荆州记》，该书是南朝宋盛弘之所撰。虽然《荆州记》后来失传了，但《三峡》的这一段却记载于《太平御览》第五十三卷中。

在不疑处生疑，并且能推翻历史上板上钉钉之事，这真是让人钦佩。对《水经注》的研究，是清代的一大显学，《水经》原文仅一万多字，郦道元给此书做注，字数却超过了原文二十多倍。说是做注，其实是以《水经》为蓝本，全部改写。而问题是，郦道元是涿州人，涿州就在现在的北京附近，前两年，我还找到了郦的故居。在郦道元的时代，因为南方北方连年征战使得郦道元无法到南方去核实《水经》中所提河流的实况，所以《水经注》中关于南方河流的描述，大多是郦道元从其他文献中抄录而来，这难免就会产生一些错误。再加上原本四十卷的《水经注》流传到北宋时，就已缺失了五卷，当时的书商为了凑足四十卷之数，就将三十五卷拆分为四十卷。几经折腾，《水经》原文与郦道元的注文混

在了一起，难以区分。后世的很多学者，从明代的朱谋㙔到清初的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胡渭，为了搞清这部书，下了很大的气力。乾隆年间开四库馆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又对该书进行了仔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逐渐恢复了《水经注》的原貌。因为有这么多学者的参与，使得研究《水经注》变为了专门的学问，这个学科被称为“郿学”。

虽然如此，《水经注》还是有不少的问题存在，故而杨守敬决定下大气力把《水经注》进行彻底研究。因为他认为：“自全、赵、戴订《水经注》之后，群情翕然，谓无遗蕴。虽有相袭之争，却无雌黄之议。余寻绎有年，颇觉三家皆有得失，非唯脉水之功未至，即考古之力亦疏。往往以修洁之质而漫施手澣者，亦有明明斑疣而失之眉睫者。”

杨守敬为了研究《水经》，下了极大的气力，为此他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这部书直到他去世都没能发表出来，但他的研究成果却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杨守敬的这部《水经注疏》，被今人誉为中国沿革地理学的高峰，郿学史上的丰碑。

辛亥革命时，杨守敬避居上海，观海堂藏书在武昌幸得革命军保护，未遭兵祸，后因校订《水经注》之需，相关藏书运往上海。1914年，杨守敬来到北京，他的藏书也部分北运。转年，杨守敬在北京病逝，观海堂北运藏书被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推动政府以七万余金将这些藏书收为国有。1918年，梁启超呈请将政府所购观海堂藏书纳入松坡图书馆收藏，政府核准后，将其中部分藏书拨予松坡图书馆。1949年，松坡图书馆归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于是这一部分，入藏今日的国家图书馆。民国政府收购的未拨予松坡图书馆的观海堂藏书，入藏故宫博物院。后因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部分观海堂藏书流至台湾，入藏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未北运余留在武昌的那一部分，在1939年，由杨守敬之子出让给湖北省图书馆。这就是杨守敬观海堂藏书的归宿。

柯逢时

(1845—1912)

字懋修，号逊庵，钦臣，晚年自号息园。湖北武昌人，光緒九年（1883）进士，改庶吉士，光緒十二年（1886）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西布政使，贵州、广西巡抚。1905年任户部右侍郎，1907年任浙江巡抚督办土药统税事宜，还曾任湖北商办铁路公司名誉总理。

柯逢时·息园

书楼无痕，绍裘尚在

柯逢时是清末武汉三大藏书家之一，但他的藏书事迹，历史资料留下来不多。柯逢时藏书的来源，一部分来自李嘉绩旧藏5万多卷；还有一大来源是裘日修旧藏的800多种抄校本，后来听说，在柯逢时去世之后，这批书全部被日本人买走了。今日的柯逢时故居寻找，最让人意外的是这个旧居遗址的附近都是红色革命遗迹。

柯逢时的故居处在武昌的都府堤一带，而今这一带几乎全是仿古建筑，这里还有几处重要的红色遗址。在路的另一头，看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沿着路再往前走不到100米，就看到了毛泽东旧居纪念馆。我向里张望了几眼，雨中的纪念馆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沿着纪念馆门前的路继续向前约30米，这就是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五大会址纪念馆门口的一片绿地公园就是柯逢时故居遗址。

眼前的这片绿地，看样子占地约十几亩，应该是近些年修造的人造景观。公园属于开放式，四围没有栏杆和围墙。在入口的位置，有一块桌面大小的石头，上面用中英文刻着“武昌廉政文化公园”。我等四人，每人打着一把伞，走入这个公园之内。雨中的公园果真安静，不但没有行人，连鸟鸣也听不到一声。我寻找着跟“廉政”有关的文化标记，但在里面转了一圈儿，除了看到一些绿植，剩余的就是我那把漏雨的破伞，灌了我一袖筒的水。

我多少有些不死心，希望在这里面能否找到哪怕一丁点儿跟柯逢时旧居有关的遗迹。陪我同去的柯家后人小柯劝我，不要再抱这个幻想，因为不可能还能找到什么相关的东西。小柯简约地说，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柯家的后人从武昌搬到了汉口。这个搬迁是被迫的，因为柯逢时的旧居很大，日本人要征用，包括附近的几个大户人家。日本人同时告诉他们，必须三天内搬走。于是柯家就匆匆地搬离了此地，从此就再没有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为什么搬走后就不再回来呢？听到了我的问话，小柯愣愣地盯着我，忽然说了一句：“哎，柯逢时辛辛苦苦给慈禧太后打工多年，57岁和66岁才有了两处家业，新军和咨议局的朋友来了，黎元洪、汤化龙好好招待；同盟会的朋友来了，黄兴、石瑛好好招待；地下党来了，董必武好好招待；最后日本人一来，美国人飞机一轰炸，烟消云散，什么都没有了。”

我没想到他说出来这样一番话，并且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从中品不出感情色彩，他其实对自己的家族史有着很详细的了解。能遇到这样的后人，我潜意识告诉自己，恐怕从他那里能得到很多不为人知的过往真实故事。